

《東華漢學》第 38 期；329-37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3 年 12 月

論西西《我城》的多元他者與「我城」意識

湯莉莉*

【摘要】

身份問題是香港文學研究的重要議題，香港文學獨特的經驗為研究香港意識衍變提供了重要線索。《我城》是西西創作的分水嶺，她想好好寫寫七十年代香港這群年青人，寫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城，《我城》也被視為香港社會身份意識變遷的發軔之作。身份的探尋往往與「他者」分不開，「他者」對於自我身份意識的定義、建構和完善必不可少。本文以此為背景，分析《我城》內部隱含的文化認同與身份意識問題，梳理香港身份意識萌生與「他者」的脈絡。《我城》中的他者不是單一的，是多元的，「我」和多元他者並非對峙、截然二分的關係，有的時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依存關係，如何面對「他者」是在現代社會確立自己最重要的態度。本文藉《我城》中三個「他者」來探討身份意識，分別為：「飄零者」、「理想的安頓之處」以及「攝影式觀看」。「飄零者」對於寄身之處充滿著疏離感，孤立、自我封閉，「飄零者」指向「我」已是此地的安居者，慷慨、迎納他人；「理想的安頓之處」

* 香港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講師

扣問安居者們，「我」在此地/這城的責任意識；人的「觀看」方式影響對自我、世界的建構。「攝影式觀看」提醒「我」所見的是暫時的、有限的，「我」是否能夠自省自覺，思考如何面對這個無常的人生和居住的「這城」。

關鍵詞：西西、《我城》、他者、身份、香港

一、香港意識與多元他者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對身份的關切一向是香港研究的重要議題。由於香港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不斷變遷，香港的文化和身份意識處於不斷重塑的狀態。¹近年來香港面臨的身份意識危機愈演愈烈，變動與衝擊中，往往是省思身份的良好機緣。身份的原意「就是一個個體所有的關於他這種人是其所是的意識」²。身份認同這個課題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才在社會人文學科的討論中佔據某種中心位置³，其在文學研究中佔據一席之地則要更晚一些。身份認同是主觀的社會氣氛，並不是單一的因素所能左右的。「香港」的文化身份並不是在殖民與反殖民的簡單二元對立中建立起來的，它涉及多重關係構築的場域，是一個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來的。「身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經由文化塑造和建構的，必須在各種語境下加以「想象」和「再現」。⁴

香港文學獨特的本土經驗也一直成為研究「身份建構」的重要線索，香港文學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較受學界重視。⁵誠如王德威在討論小說與中國的關係時，指出「小說之類的虛構模式，往往是我們想象、敘述『中國』的開端」⁶。文學香港也是藉文學敘述來重新「想象」

¹ 張玲鈺、葉浩威、安寧，〈文學地理學視野下香港文化認同〉，《熱帶地理》第6期（2019.11），頁880-888。

² Peter Staffon & Nicky Hay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Edward Arnold, 1998, p. 87.

³ 範可，〈信任、認同與「他者」：族群和民族省思〉，《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十五卷第6期（2013.11），頁44-52。

⁴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 223-225.

⁵ 陳潔儀，〈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東華漢學》第8期（2008），頁231-253。

⁶ 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頁15。

香港的都市身份、重新建構香港文化認同的一種重要方式。⁷ 文學語言不僅反映了小說作者對香港社會的細緻觀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相關社會主體本身所面臨的身份困擾。不少香港社會學研究者認為香港人的身份歸屬，經由殖民化以至本土化的過程，從難民、僑民到香港人的身份轉化、蛻變與建構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的事情，正如社會學家呂大樂說「整個七十年代，就是建構一個自成一體的香港社會的過程」⁸。那時候大眾傳媒開始迅速發展，文學作品以報刊雜誌為載體深入香港民眾生活，成為了塑造香港身份與認同的中堅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西的《我城》。

《我城》寫於1974、75年間，最初連載於1975年香港的《快報》，全書十八章，小說人物阿果、麥快樂、阿傻、阿游、阿髮、悠悠、看門的阿北等都是普通香港人，在城市中過著平凡的生活，小說散發式地敘述了他們日常瑣碎生活中的各種感受、經驗，每個人的視域不同，恰好組成都市的各個面向。《我城》作為香港文學的經典，歷來研究者眾多。長年研究西西作品的陳潔儀對《我城》推崇備至。她觀察到，九七以後對《我城》的探討，焦點轉移至其中的「香港意識」議題⁹，此前研究者們更關注《我城》結構與語言上的實驗傾向¹⁰，例如何福仁寫於1988年的〈《我城》的一種讀法〉¹¹道出《我城》中國式手卷的呈現方法，邀請讀者從多角度觀看這城。有關西西《我城》香港身份意識的研究不少，一些學者認為《我城》反映了香港身份意識的萌生。譬如王德威早在1998年就以《我城》為標記，指出它開始擺脫了過去強調異域風情的

⁷ 羅崗，〈想象香港的一種方式〉，《二十一世紀》第6期（2001），頁64-73。

⁸ 呂大樂，《唔該，埋單》（香港，閒人行，1997），頁268。

⁹ 陳潔儀，〈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東華漢學》第8期（2008），頁231-253。

¹⁰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讀西西《我城》〉，《思與言》第五十六卷第2期（2018），頁73-113。

¹¹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西西研究資料（第二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38-54。

敘述習慣，寫出「城市共同憂戚與共的命運」。¹² 潘國靈的〈《我城》與香港的七十年代〉關注《我城》所反映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現實。¹³ 王強分析了《我城》的社會歷史意識。¹⁴ 張玲鈺、葉浩威、安寧¹⁵以及金惠俊¹⁶等從空間、文學地理學視野探究《我城》與香港文化認同的聯繫。另有學者聯繫西西《我城》之後的創作，探究「香港意識」的建立與幻滅，如陳智德的〈解體我城：由《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文中指出〈解體〉指向七十年代一輩人的文化信念以及城市觀念的解體。¹⁷ 陳潔儀認為《我城》在香港本土歷史和身份認同上具備「紀念碑」式的文學地位¹⁸：

《我城》無疑是建立香港身份意識的「地標」，而且相對於前「傾」後「失」的頹垣敗瓦，《我城》在這條香港故事的線索上，更加像一本紀念碑式的小說，巍然矗立，供「失城」之後的人懷戀憑吊。¹⁹

不過，另一些學者如危令敦、朱耀偉等學者認為香港「身份認同」和「家」的觀念本身是浮動和虛幻的，香港文學的主體性不能單純從「身份意識」角度去切入。²⁰ 陳燕遐從西西《我城》，《浮城》到《飛氈》

¹²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279-307。

¹³ 潘國靈，〈《我城》與香港的七十年代〉，《E+E》，2004。見《西西研究資料（第 2 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 55-70。

¹⁴ 王強，〈分離與建構：西西《我城》與香港意識〉，《西西研究資料（第 2 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 111-119。

¹⁵ 張玲鈺、葉浩威、安寧，〈文學地理學視野下香港文化認同〉，頁 880-888。

¹⁶ 金惠俊，〈西西《我城》中以空間為中心的香港想象與方式〉，《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十二卷第 2 期（2015），頁 104-124。

¹⁷ 陳智德，〈解體我城：由《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西西研究資料（第 1 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 200-211。

¹⁸ 陳潔儀，〈從「接受」到「經典」：論臺灣文學評論界對於「傳播」西西小說的意義〉，《淡江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3），頁 305。

¹⁹ 陳潔儀，〈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西西研究資料（第 2 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 73。

²⁰ 參見危令敦，〈不記來時路：論李碧華的《胭脂扣》〉，收於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 161-195；朱耀偉，

的城市想象探索中體認到「『本土』從來不易界定，它永遠是個開放、競爭的概念」²¹。謝曉虹延續對《我城》「香港意識」的思考，指出《我城》瓦解了一直以來對「集體認同」的歷史想象，小說中的阿果等年輕人獨行城市間，拒絕所謂「集體認同」的意識形態，他們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本土」，而「本土」也有著流動變化的可能性。

綜上，學者們大多認為《我城》參與創造了「香港意識」的想像，不過這些研究仍然留給我們思考的空間，香港作為一個高度流動的國際大都市，「香港身份認同」或「本土」這些具流動性的概念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城」一直在，西西《我城》中「天佑我城」²²的祈願因何而起？語義結構上，「我」和「城」是所屬關係，「我」何以宣示「城」的所有權？九七之後，「城」依舊在，「我」又何去何從？「我城」除了「解體」、「幻滅」，是否依然可以從《我城》的文學想象中得到啟發？

本文擬從「他者」切入，希望可以解答上述問題。「他者」(The other)是相對於「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人與事。身份認同可以讓人在不同文化及社會圈子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自己所屬的生活群體。找到自己的定位，一般要以其他群體或事物作為自己的「他者」，對照出自身的文化特徵來。「他者對於自我的定義、建構和完善必不可少，自我的形成依賴於自我與他者的差異、依賴於自我成功地將自己與他者區分開來。」²³「他者」這個概念在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中，有著廣泛的討論，就文學評論而言首先被女性主義運用到對父權社會的批判中，其後出現在後殖民文學批評以及生態批評中。²⁴文學研究中以「他

〈小城大說：後殖民敘事與香港城市〉，收於黎活仁等主編，《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頁403-426。

²¹ 陳燕遐，〈文學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從《我城》、浮城，到《飛氈》〉，《西西研究資料（第2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261。

²² 西西，《我城》（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頁160。

²³ 張劍，〈他者〉，《外國文學》第1期（2011），頁118-127。

²⁴ 同前註，頁124-127。

者」為焦點的，一般比較強調「他者」與「我」的對立或者差異，確實不少文學作品「在形象創造者的層面上，『他者』形象都無可避免地表現為對『他者』的否定，而對『我』及其空間的補充和延長。這個『我』要說『他者』，卻在言說『他者』的同時，這個『我』卻趨向於否定『他者』，從而言說了自我」²⁵。「他者」雖然在理論上隱含了自我與他者的對立，不過人並非生活於與他者對峙的情境。沈清松認為後現代思潮其中一個正面的貢獻是由「主體性」轉向「他者」²⁶，人在與他者對話、回應他者的過程中，建構自我意識。

《我城》很重視「自我」與「他者」的分界，西西本人的創作也是以七十年代中期文學中那種「冷漠而陰暗」的調子為「他者」，認為那不合她的個性，當時在報章流行的小說，多以成人的語言思維寫成人的世界，沒有人講青年人的事，沒有人理會青年人的世界，於是西西「決定寫個活潑的小說，就寫年輕的一代，寫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城，用他們的感覺去感覺，用他們的語言去說話」²⁷。西西在訪談中談及寫《我城》的契機，是因為在晴朗的季節，她看見穿著一條牛仔褲的人，穿了一件舒服的布衫、一雙運動鞋，背了一個輕便的布袋去遠足，頭髮上都是陽光的顏色。忽然就覺得，現在人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樣了。她不求深明大義，只想好好寫寫香港這群青年人，活潑，充滿朝氣，彈著吉他唱巴布·狄倫（Bob Dylan）的歌，「他們做的不過是卑微的工作：看守公園，修理電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難得的是相當明白事理，有藏於內心的正義感，對生活的要求很踏實，很樸素……生活環境困難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樂樂」²⁸。

²⁵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71。

²⁶ 沈清松，〈五十年來中國哲學的花果飄零與海外華人的生命意義構想〉，《漢學研究》第三十一卷第2期（2013.6），頁25。

²⁷ 西西，《我城》（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序言。

²⁸ 孫凌宇、林瀾，〈文化西西「我城」的啟示〉，《南方人物週刊》2021.3.9，<https://www.nfpeople.com/index.php/article/10536>

此前《我城》的研究罕見以「他者」為研究焦點的，一些研究提及與小說裡年輕人阿果等相別的人，如上一輩移民者²⁹，難民³⁰等，或者論及「城」的參照語境³¹等，不過關於這些參照的肌理、內涵以及這些參照之間的聯繫，仍存在追問和探究的空間。人生活於多元他者（many others）之中，「他者」不局限於眾多的「他人」，大自然、理想和終極真實等也是人的多元他者³²。《我城》中的他者不是單一的，是多元的，並且「我」和多元他者並非對峙的關係，本文不僅僅停留在梳理「自我」和「他者」的差異，如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理論所提出的，如何面對「他者」才是在現代社會確立自己最重要的態度³³。《我城》中「我」如何面對「他者」，這些多元「他者」之間如何交互辯證，亦是本文探究的重點。以下章節將逐一解析《我城》中三個重要的多元「他者」：「飄零者」、「理想的安頓之處」及「攝影式觀看」，以此再思「我城」意識的動因。這三個他者分別對應「我」、「我城」與「自省式觀看」。「飄零者」是關於「人」的他者，讓「我」意識到「我」不再飄零，已經開始扎根、安居此地。「理想的安頓之處」是「空間」他者，可分為兩層，一是飄零者心嚮往之的故國故鄉，讓「我」醒覺與此城的情感聯結，二是「我」暢想的美麗新世界，提醒「我」安居此城的責任。最後，「攝影式觀看」是由小說中的人物阿傻引發的思考，此前對阿傻這個人物探究不多，「我城」一詞是由阿傻首先說出來的，阿傻發出了「天佑我城」的祈願，西西為何如此設計安排，解鈴還須繫鈴人。本文透過分析阿傻的觀看與西西的觀看，以及各自觀看到的「我城」，說明西西以自省式觀看的方式觀看、思考，構

²⁹ 張玲鈺、葉浩威、安寧，〈文學地理學視野下香港文化認同〉，頁 880-888。

³⁰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讀西西《我城》〉，頁 73-113。

³¹ 陳智德，〈解體我城：由《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頁 205。

³² 沈清松，〈五十年來中國哲學的花果飄零與海外華人生命意義構想〉，頁 25。

³³ 賴俊雄，《他者哲學：回歸列維納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序言。

建「我城」的世界。人如何「觀看」影響人構建身份意識，「我」和「我」未必一致，「城」也在變，自省式觀看者看到這些變化、差異，對話、思考並整合為自己理解「我城」的養分。本文認為西西的「我城」意識最終不一定是對特定獨一空間如香港的認同，而是一種推己及人、關懷他者以及自省自覺的責任意識。本文期望為身份研究提供可行的多元「他者」視角，希望這能成為本文的價值所在。

二、飄零者與「我」

人是意識的主體，籠統來說，除了「我」或「我們」之外的他人皆為他者。《我城》中人物眾多，有名字的人物大致有：與「我」——阿果有親緣關係的母親秀秀、姨媽悠悠、妹妹阿髮、姑媽荷花們，幫忙看門的阿北，阿北的師弟阿東，阿果的朋友麥快樂、阿游，麥快樂的同事花王傻、鳳姐、彩姐，麥快樂的鄰居阿探，麥快樂的朋友阿傻、阿郵，其他形形色色的人有樓主、賣保護兒童會銷售獎券的小孩、兜銷貨物的女孩、搬家公司的人、電話公司的面試官、鄰居、一名戴著鴨舌帽的導演、一個正在練習演講的人、公園裡的流浪漢、難民、舞劍的人、電視臺的新聞評述員、搶劫麥快樂的人以及一個住在樓頂的老人等等，哪些是「我」或「我們」？哪些是相應的「他者」？何福仁認為《我城》中的「我」和悠悠、阿髮、麥快樂、阿北等同聲相應，構成「我們」³⁴，社會學家呂大樂認為七十年代香港的人口結構由浮動人口鞏固為具備固定人口結構的雛形，於七十年代初，「『我們』的概念便迅速強化、成形」³⁵。那麼塑造「我」或「我們」意識的「他者」是什麼樣的人？

《我城》開篇以「我」——阿果為敘述視角記述搬家與父親出殯前後的故事，小說著力描寫的與「我」相對應的「他者」之一——荷花們

³⁴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頁 44。

³⁵ 呂大樂，《唔該，埋單》，頁 109。

也因此登場，「她們則是我父親的兩個妹妹，一個姐姐」³⁶，「我記得她們像荷花」³⁷，小說後文稱她們為荷花們。小說中其他有名字的人物大都沒有以複數稱呼，荷花們以複數命名，似乎隱喻了一群人的特徵。荷花們是大屋的舊主人，大屋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香港，先後居住於大屋的人成了一組互相參照的對象。以往的研究常以代際為區隔的標記，政府報告*Hong Kong 1974*也持如是觀點，「最大的推動力來自年輕一代，他們隨著成長將香港接受為自己的家，切實地揚棄了上一代的過客心態」³⁸。「荷花們」是上一代人，不過是否上一代人都抱持過客的心態，悠悠和阿北也是上一代人，卻與我、阿髮等心意相通；年輕人又是否都如阿果、阿髮般接受香港為家，阿游在船上遇見的兩個年輕人，出去了就永遠不想回來了。小說與現實處境都顯明世代間壁壘分明的劃分未必合理。本文從文本出發，細究荷花們的人物特徵，以荷花們為切入點，探究荷花們如何參與「我」或「我們」的建構。

《我城》中「荷花們」和「阿果」等人的人生態度、生活方式以及對這座城市的情感等有明顯的差異。「花」、「果」意象讓人聯想起從大陸旅居香港的哲學家唐君毅，他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中以「花果飄零」的意象來說明華人之飄散四方，之後為「花果飄零」的海外華人提出「靈根自植」的構想³⁹。「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是兩種對比鮮明的狀態。《我城》將「果」分離了出來，似乎預示著「花」飄零的同時，「果」已悄然自植靈根。《我城》的人物原型與唐君毅的論述某程度上的共鳴是偶然還是必然，不得而知。哲學界對於唐君毅「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概念及延伸有諸多探討⁴⁰，本文不做太多鋪陳，不過，本文將引述唐君毅的論點作為線索之一來幫助我們理解西西

³⁶ 西西，《我城》（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頁1。

³⁷ 同前註。

³⁸ *Hong Kong 1974*，頁1-2。

³⁹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2。

⁴⁰ 沈清松，〈五十年來中國哲學的花果飄零與海外華人生命意義構想〉，頁7-34。

在《我城》中如何藉「他者」來建構「我」的意識，「靈根自植」某程度上標示著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更新。

小說中「荷花們」共出現二十八次，其中一半以上的語境在講述荷花們「飄零」的經歷。當代華人的遷徙痕跡與戰爭有著密切的關係，除了太平洋戰爭，還有內戰的歷史陰影，荷花們也被此歷史痕跡所刻劃，或許因為戰亂客居香港暫且容身，又在香港陷於戰亂時離開，來來回回中顛沛流離、漂泊無依。如小說中所記述，「打仗的時候，荷花們的父親和荷花們一起搬到別的地方去了」⁴¹，「後來，仗打完了，荷花們回到大屋子來，荷花們沒有了父親，阿北沒有了妻子，門都無恙。又過了很久，荷花們又搬走了」⁴²，「荷花們乘機器鳥走了」⁴³，「荷花們又說，她們不知道多少年後會再回來，說不定的是，不回來了」⁴⁴。與其將荷花們簡單歸類為上一代人，不如說她們是一群「飄零者」，而阿果、阿髮、悠悠他們則是「安居者」。

離鄉背井，飄零或離散（diaspora）是當代中國人生存的重要經驗，長期的故鄉遠隔、逃難、寄居海外，人心、文化、家國支柱皆已解體：

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⁴⁵

這種飄零感反映著對於「寄身」之處的疏離感，荷花們對「此等有如喝著菊花時節龍井的第九級茶的巢不屑一顧，她們是懶於，也是不屑於，回顧，云云」⁴⁶，大屋的生活對於荷花們來說是一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他們對居於此地難以欣悅安然，只是暫住一下，內心或許也難免悲歎：「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

⁴¹ 西西，《我城》，頁 75。

⁴² 同前註，頁 75。

⁴³ 同前註，頁 75。

⁴⁴ 同前註，頁 2。

⁴⁵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2。

⁴⁶ 西西，《我城》，頁 2。

生，皆神明華胄，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驅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⁴⁷

離散和飄零的歸宿何在呢？唐君毅不僅為華人「花果飄零」提出診斷，並為海外華人提出其生命意義的構想，認為在異域定居的華人應將原有靈根植入新的文化脈絡，稱之為「靈根自植」：

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亦必能隨境所適，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⁴⁸

對於荷花們來說，無可奈何的飄零感讓他們在悲苦低迷中失卻了「靈根自植」的前提——「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⁴⁹，西西筆下「荷花們」時常與否定副詞「不」一起出現。荷花們似乎並不享受此城的生活，「荷花們一定不愛唱。荷花們亦不喜歡走路，她們揮手囑我自己去到處走」⁵⁰；荷花們對人對事看上去漫不經心，無甚熱忱或好奇心，為荷花們看門的阿北擅長做門，「荷花們的父親從來不來看阿北做門，荷花們也不來看」⁵¹。荷花們也有「積極」的時刻，小說第七章荷花們嘴裡出現了另外一群人「蘭花她們」，「蘭花她們家裡有很多書，蘭花她們喜歡看書」⁵²，大屋裡有很多書，阿北記得「荷花們的父親從來不看書，荷花們也不看」⁵³，「有這麼多美麗好書的人竟看也不看」⁵⁴，「荷花們說過：我們的書可比蘭花她們多呵」⁵⁵。荷花們的大屋裡有一架鋼琴，「那琴，從來沒有人彈過」⁵⁶。

⁴⁷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27。

⁴⁸ 同前註，頁 57-58。

⁴⁹ 同前註。

⁵⁰ 西西，《我城》，頁 2。

⁵¹ 同前註，頁 77。

⁵² 同前註，頁 81。

⁵³ 同前註。

⁵⁴ 同前註。

⁵⁵ 同前註。

⁵⁶ 同前註，頁 80。

阿北聽見荷花們這樣說過：

——連蘭花她們都沒有

——我們有⁵⁷

荷花們有很多書卻從來不看書，有鋼琴卻從未彈過，她們熱衷攀比，或許移民這城的生活對於荷花們來說僅是在鄉里鄉親那裡炫耀的資本，攀比讓人迷失自我，忽略了認識自己以及體察自己原本擁有的。荷花們未能反省檢視其所在所是，自然難以自植靈根。真正能夠靈根自植的是，「人亦能真正認識其自己之存在，肯定承認其自己之存在，能自尊自重，自作主宰」⁵⁸，這在阿果、阿髮、阿游、阿傻、麥快樂、悠悠等人的身上卻「創造性地實踐」了。

阿果從荷花們那裡承接大屋，欣然「安居」大屋，「隨境所適」⁵⁹。「這座古老而有趣的大屋子」⁶⁰，「我看見屋子，（……）大屋它獨個兒凹在一個角落上，別的房子高，它矮；別的房子瘦，它胖；別的房子開朗活潑，它笨，又呆。這，我想起來了，它完全如同我阿果。」⁶¹阿果將大屋對比別的房子，別的房子越光鮮亮麗、高大廣闊，我的屋子越寒慘，卻在鮮明對比中，越顯得我能夠悠然在家宅中感到安全，「好結識這房子的房牆門窗，幾桌椅，碗桶盆，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⁶²。大屋意象於阿果而言蘊含著「休憩」、「安居」之可能，巴修拉（Bachelard）以「受庇護的意識」來描述此情境⁶³，這是一種彰顯親密的意象，阿果覺得大屋就像「我」這個人，自此「我」緊密地與「大屋」連為一體。「靈根自植」本就是反省自覺自己的存在、扎根於此

⁵⁷ 同前註，頁 81。

⁵⁸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54。

⁵⁹ 同前註，頁 58。

⁶⁰ 西西，《我城》，頁 1。

⁶¹ 同前註，頁 1。

⁶² 同前註，頁 2。

⁶³ Bachelard, Gaston. *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e la volonté*. Paris: José Corti, 1947, p. 112.

地的意義，而在此地扎根則顯示與此地的親密關係，進而「自信自守」，自植靈根。

「花果飄零」預示著生命的萎縮和離散，而「靈根自植」則重拾生機。《我城》中有很多章節記述了阿果、麥快樂等如何真切地投入並體驗這座城市的生活，「自尊自重，自作主宰」⁶⁴，在他們的視野中，這個城市生機勃勃。阿果和麥快樂穿著陳舊牛仔褲走街串巷、攀高爬低去修理電話，對於這個苦力活滿心覺得有趣，「我覺得我的工作很有趣，這麼高高地站在大街上空，看得見底下忙碌的路人」⁶⁵。放假時，他們一起去郊外遠遊，他們奔跑、划船、唱歌、聊天、玩遊戲，歡欣快樂，「搖搖小船，順水河面浮，真快樂真快樂真快樂真快樂，好像夢裏遊」⁶⁶，熱切地吶喊：「我喜歡這城市的天空」⁶⁷，「我喜歡這城市的海」⁶⁸，「我喜歡這城市的路」⁶⁹。

人若能在「自尊自重，自作主宰」下成就自己，就會有「自樹自立為頂天立地之人格」⁷⁰。如是，這種「自樹自立」推動人去超越自己，走出自己熟悉的圈子和自我封閉，與他人、與城市聯結，並能善待他人與所居住的空間。阿果搬來大屋後，很快和看門的阿北變得熟絡起來，荷花們和荷花們的父親從未看過阿北做門，而阿果、阿髮、悠悠卻都來看阿北做門，阿果還拿了兩隻粽子下來請阿北吃，他們就這樣很自然地走進了阿北的世界，成了阿北的朋友。再如小說第五章，阿果的妹妹阿髮看到住所天臺上時常堆滿垃圾，真誠地寫信給鄰居們，希望大家一起想辦法建造一個更美好的家園，阿髮雖只是一名中學生，然而從她自信自尊自重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她頂天立地之人格。

⁶⁴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58。

⁶⁵ 西西，《我城》，頁 99。

⁶⁶ 同前註，頁 143。

⁶⁷ 同前註，頁 151。

⁶⁸ 同前註，頁 151。

⁶⁹ 同前註，頁 152。

⁷⁰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55。

親愛的鄰居：你們好。我是阿髮，頭髮的髮。（……）因為天臺上都是垃圾，毬子自然沒有得踢了。（……）我一面看一面想，如果天臺上種些花，將來牆上就有橙紅燈籠花，粉紅喇叭花，豈不好。（……）祝你們好。

你們的朋友

阿髮敬上⁷¹

荷花們「居」於這城，卻不能「安」，而阿果們則自由探索著這座城市的美麗；荷花們為飄零感所困，除了與親戚有連結，小說中沒有提及荷花們的朋友，而阿果們卻結交朋友，一起投入平凡有趣的生活，雖然從事的只是電話維修工、海員這些所謂藍領的工作，生活困難重重，他們卻自信而怡然自得；荷花們擁有鋼琴，卻不享受音樂，擁有書籍，卻從未體會閱讀之樂，而阿果們盡情歌唱，聆聽彼此，聆聽書裡的聲音。初來乍到的悠悠在荷花們滿牆的書架上看到很多好書，愛不釋手。

悠悠站在書架的前面，卻聽見書本和書本在談話：

——大概要熱鬧起來了

一本書說。

——要終結這百年孤寂了吧

另外一本書說。⁷²

荷花們的生活在西西的筆下是「百年孤寂」、「寥落」的狀態，或許過往「飄零」的經驗讓她們被困住。荷花們的存在讓阿果們意識到自己與他們不一樣，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情感也和他們不同，阿果他們已經開始扎根、安居此地。不過從文本來看，阿果和荷花們並非處於對峙的狀態，他們之間互敬互重，荷花們慷慨地贈大屋予阿果他們。阿果他們如何面對他者呢？小說兩處提到「我對她們（荷花們）點我的頭」⁷³，接受她們的善意，並保持自己的界線。阿果他們搬家，荷花們送來電視

⁷¹ 西西，《我城》，頁 49-54。

⁷² 同前註，頁 83-84。

⁷³ 同前註，頁 1。

機作為喬遷的賀禮，裝妥各式線路裝置，阿果他們也開開心心接受，投入看電視。

面對城市裡的他人，阿果、阿髮、麥快樂等總是期望與人溝通、對話，勇敢地走向他者，如麥快樂，做管理員時喜歡幫助別人，最後被人誣陷遭解職；後來他去電話機構，架電話線、修理電話，試圖架起都市人溝通的橋樑；上夜班的路上，不幸遭到歹徒襲擊，他立即離職去當警察，維持社會治安。現實也許不盡如人意，但是麥快樂始終有一顆單純助人的熱心。阿果和麥快樂希冀人與人之間對話、溝通沒有阻礙，這也是他們選擇去電話公司上班的重要原因，「電話其實就是耳朵」⁷⁴，因為那是「傳達的媒介」⁷⁵，讓城市裡的人彼此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

而除了城裡曾經飽經飄零的「他者」荷花們，阿果他們還面臨著另一群正在經歷飄零無依的人：難民。《我城》中「難民」共出現八次，均出現在阿游的敘事中，其中五處與城相關，船上的人問剛上船的阿游，城怎麼樣了，阿游立刻想到的是：「來了很多的難民。有的是幾十個人一起來，乘飛機來，都已經離去了。有的乘船來，上千的人。乘飛機來的難民，住在城內的一個營裏。乘船來的難民多，他們住在郊外的軍營裏。」⁷⁶「他們有的越過一座座山」⁷⁷，「還有一些人，從水面上來」⁷⁸，「他們在海面上度過了許多個晨昏，在半路上，他們有的被鯊魚吃剩了一截身子，有的在水中逐漸腐爛，到了這城的沙灘上時，已經面目模糊、屍身不全了」⁷⁹。阿游的描述觸目驚心，他人的痛苦時常扣問著「我們」，「這麼多的難民，怎麼辦呢」⁸⁰？「我」如何回應？小說提及國外某城也來了一艘裝滿難民的船時，那「城說：你看看我們，

⁷⁴ 西西，《我城》，頁 86。

⁷⁵ 同前註，頁 43。

⁷⁶ 同前註，頁 165。

⁷⁷ 同前註，頁 168。

⁷⁸ 同前註。

⁷⁹ 同前註。

⁸⁰ 同前註，頁 165。

我們缺乏糧食，我們水荒，我們沒有足夠的樓房，我們有半城的人失業。那船不作一聲載著滿船的難民默默離去了」⁸¹。國外那城沒有收留那些難民，那些難民繼續飄零四方，甚至消逝。我們這城呢？小說提到，這城的許多人「帶備糧食和水，對迎面走來的人親切地說話：你餓了嗎，你的腳受傷了呵。於是，他們給流血的傷口以藥，給飢餓的軀體以糧。眾多的外衣和鞋，都披在陌生者的身上了」⁸²。這城的人對飄零的難民陌生者展現出莫大的善意和同情，相信阿游、阿果等也如是。正如列維納斯的他者理論所述，「我」迎納他人乃是因為我已經收到他人的迎納⁸³。「我」接受了他者荷花們的迎納，而回應此迎納的則是敞開自己的屋宅迎納他人，如此方能使此處的棲留並非孤立而自我封閉的佔據⁸⁴。阿果、麥快樂等接受他者的容納，自植靈根於這城，不僅自己棲息此城，也走向他者，關懷他者。

然而，安居者是否一直能抱持迎納之意識，安然棲居？飄零者由故土漂泊至他鄉寄人籬下，是否終其一生漂泊無依、自我封閉？《我城》對此並無著墨，其實這取決於人如何看待自己與安居之地的關係。人與安居之地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呼喚與回應，但不應該是佔據的回應，而是敞開的回應。⁸⁵這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任重而道遠，這一點下文將進一步分析。人本質上都是客旅，無論飄零何處，於寄身之處也可以有挺直的精神、隨境所適，在漂泊的體驗中承擔苦難，誠如唐先生所描述：「人在深崖萬丈之旁，顯出其自處之高。」⁸⁶飄零者或許可以在接受他人的迎納時，勇敢面對、處理自己的破碎與苦難，放下故土執念，轉而共情他人、迎納他人，認識其自己之存在，「自作主宰」⁸⁷，自植靈根。

⁸¹ 同前註，頁 171。

⁸² 同前註，頁 168。

⁸³ Emmanuel Lé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1980: p.129.

⁸⁴ Emmanuel Lé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p146.

⁸⁵ 黃冠閔，〈飄零乎？安居乎？——土地意象與責任意識〉，《中國文哲研究論壇》第十八卷第 2 期（2008），頁 217。

⁸⁶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47。

⁸⁷ 同前註，頁 54。

而安居者若不能時常自省自覺繼續往深紮根求索，漸生自我為中心的佔據心態，凡事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自覺高人一等，恐怕雖外表枝繁葉茂，卻紮根不深，待有狂風驟雨之時，難免樹倒廈傾。由此可見，「安居者」與「飄零者」的關係不是完全割裂開來的，是相互交匯、啟發的。

三、理想的安頓之處與「城」

上文論及作為「人」的他者——飄零者寄居於異地的光景，也論述了飄零者與「我」這樣的安居者之間的關係，「我」根植於此城的意識積極而明顯，在此地扎根顯示人與此地的親密關係。有學者提出《我城》竭力排除一種本質化的集體認同⁸⁸，但究竟「我城」意識的內涵是什麼，學者們似乎解釋得不太清楚。《我城》中的「我」與「城」這種有意識的羈絆是如何相連的？列維納斯認為這種「羈絆」在字義上與「休憩」相關。⁸⁹場所或地方成為一種條件，人與場所的附著、休憩、安居關係使得一處成為「我的地方」、成為「自己的家」——例如，出生地、祖國、地球等等⁹⁰。身份意識是一個人意識到他和他所生存的文化環境的聯繫，並作出關於其生活意義的解釋。⁹¹身份的認同建立於對「空間」與「地方」的歸屬。城早已在此，只是誰能發現「此城」、認同「此城」呢？他者視角同樣能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問題。《我城》的「空間」他者可分為裡、外兩個層次，其一，外層的「空間」他者是飄零者心中的安頓之處。飄零者認為異地他鄉非理想的安居之處，家邦鄉土自然成為飄零者理想中的安居休憩之處。其二，裡層的「空間」他者是「我」心中理想的安頓之所——即小說中提及的「新的星球」或「美麗新世界」。

⁸⁸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讀西西《我城》〉，頁 99。

⁸⁹ Emmanuel Lévinas,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aris: Vrin, 1993), p119.

⁹⁰ 黃冠閔，〈飄零乎？安居乎？——土地意象與責任意識〉，頁 193-220。

⁹¹ 錢超英，〈自我、他者與身份焦慮——論澳大利亞新華人文學及其文化意義〉，《暨南學報》第二十二卷第 4 期（2000.7），頁 4-12。

裡、外兩個層次的空間他者互相作用，孕育出「我城」意識。外層的空間他者幫助「我」醒覺與此地的羈絆，裡層的空間他者提醒「我」棲居此地的責任。

首先來看外層的空間他者，飄零者心中的理想安頓之處——「國家」，對於荷花們這些飄零者，鄉土中國始終魂牽夢縈。二十世紀前半葉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直至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大饑荒導致大量難民南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一個由「難民」和「僑居者」組成的結構，加上港府殖民地統治亦強化市民對香港社會政治事務的冷漠與疏離，所以香港的意識是模糊的、零碎的、不穩定的，彼時香港沒有自己的「身份」，卻有一個沉重的包袱——中國。當時從中國大陸到香港借居的中國人難以建立對香港的認同與歸屬感，對自己的鄉土宗族有著強烈的認同，從各種同鄉會或宗親會的成立可見一斑。一些老一輩移民香港的文人知識分子習慣背負著沉重的道德使命包袱，以振興傳統中華文化為己任，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正如唐君毅所提出的「隨境所適」的「靈根自植」，其實背負著一種特殊的歷史責任：

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共負再造中華，使中國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於當今之世界之大任。⁹²

身份意識總有一所繫的場所、地方，對於許多彼時的老一輩移民香港的人來說身份繫於「中國」，「神明華胄」。須辨明的是唐君毅先生及一些老一輩香港人的「中國」情懷在文化上的意義遠勝過政治的意義，無論如何，「國」是全世界人身份認同的主要表徵方式，也成了「我城」意識建構的一個重要他者。七十年代香港社會與經濟逐步發展與穩定，戰爭的集體記憶至七十年代已經愈趨淡化。本土的流行文化深入各階層，湧現出的地方性影片、電視節目、流行歌曲及小說漫畫等都體現了本土文化的冒升，也孕育了新一代土生土長的年輕人。《香港年鑒1973》記錄了當時社會人口的年青化：「一九七二年，香港人口約四百

⁹²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58。

萬，根據統計資料，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約佔人口之一半，顯示出目前香港社會已逐漸成為青年人的世界。」⁹³人口結構轉型，香港由「借來的空間」變成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當然，如上文所述，構成「我們」的不止是年輕人，而是一群安居者，只是安居此地的年輕人群體所佔的比重比較大，就如《我城》中的年輕人們在香港出生長大，與香港社會一同成長，漸視香港為家；另一方面他們受到父母輩中華民族敘述的影響，在接觸西方文化的同時，又對那遙遠陌生的中國產生文化認同，他們對共產政權下的中國大陸所知甚少，受恐懼共產黨的政治難民社會氣氛影響，所認同的不是當前的中國，而是一個遙遠的中國文化傳統，在這脆弱的文化認同下，構成了一個潛伏的認同危機。⁹⁴

「中國」或者「國家」在西西筆下遙遠而淡漠，對「國」的陌生和疏離體現在《我城》中，「中國」只出現七次，均是在旁觀者客觀地敘述中出現。五次做定語，一次在提及「中國功夫」時出現，四次於阿游東方號的「中國人」船員一詞中出現；「中國」作為國家名稱僅出現兩次，一次出現於麥快樂的鄰居研究辣椒是由明代傳入「中國」，另一次路人在觀看白雪公主大廈牆壁上的中古武士圖時，「人叢中即傳來一聲：中國痛苦啊」⁹⁵。小說中「國家」一詞出現八次，僅有兩處指代「中國」。做船員的阿游休息時看地圖，「阿游記得他的地理，這是他在學校裡成績最好的一科。海棠，我們的國家是一片海棠葉子的形狀。阿游記得。不管你講的是國語，還是廣府話，我們的國家在地圖上是一片形狀如海棠的葉子」⁹⁶。晚清宣統年間出版的教材上，開始出現中國地圖像秋海棠葉的說法。民國成立後，《大清帝國全圖》變成了《中華民國新區域圖》，民國人沿用了宣統朝時期的秋海棠葉的說法。「國

⁹³ 《香港年鑒 1973》，（香港：《華僑日報》，第二十六回，1973）。

⁹⁴ 陳美燕、楊聰榮，〈從香港本土文化看香港人意識之形成〉，1994，頁 4，<http://web.ntnu.edu.tw/~edwiny/pdf/95-HK-ID.PDF>

⁹⁵ 西西，《我城》，頁 41。

⁹⁶ 同前註，頁 170。

家」對於這一代年輕人來說或許只是教科書上理性的文字，不抗拒但疏遠。

有趣的是，《我城》中指稱香港的「我城」、「這城」、「這個城市」共出現了三十三次，而且這城的山、海、人、街道、公園、商場、菜市場、郵局、碼頭、郊外、交通、建築和設施，生活用品和日常消費品，休閒娛樂、工作日常、道路修建、環境污染、資源短缺、請願活動等各種事物、現象，在西西筆下娓娓道來，牛溲馬勃，悉成黃金。《我城》「小說人物對世界的興趣，並不建基於家、國，甚或人類的愛，而是把所有事物視為獨一無二」⁹⁷，「因此不管從何種意義來說，城市本身才是主人公，城市本身才是故事」⁹⁸。《我城》「再現」了這城市空間的地理具象，香港或鄰近的澳門的地名、建築稍作改動後出現，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看便心領神會，例如睡獅山隧道（獅子山隧道）、翻山車車站（山頂纜車）、飛沙嘴（尖沙咀）、牛角（旺角）、荷塘（觀塘）、全灣（荃灣）、馬加澳（澳門）、打三巴（大三巴牌坊）、海港大廈（海洋中心）等許多有意編排的地名，不僅向讀者提供了文本的想象空間，也展示著空間中人物的體驗、情感與認同。譬如前文提及阿游對「國家」的認同僅僅停留在書本，沒有北望中原的家國情結，卻深深地牽掛著「我城」。阿游喜歡航海，喜歡船，喜歡流浪。阿游說：「我要到世界各個角落去走走」⁹⁹。阿游如願去了很多國家，但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這個他「摯愛的、又美麗又醜陋的城」¹⁰⁰——「我城怎麼了呢」¹⁰¹，領略了世界的美麗，卻毫不保留對「我城」最熾熱的愛和掛念，「他看見黑夜中遠遠浮現一座城市，那是一座海上的城，點綴了無數的燈

⁹⁷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讀西西《我城》〉，頁 99。

⁹⁸ 金惠俊，〈西西《我城》中以空間為中心的香港想象與方式〉，頁 111。

⁹⁹ 西西，《我城》，頁 161。

¹⁰⁰ 同前註，頁 163。

¹⁰¹ 同前註，頁 197。

盞。是我城嗎，是我城嗎。阿游忽然喊。他以為他回到自己居住的城市來了」¹⁰²。

小說第十二章，阿果和朋友們去香港的郊外遊玩，他們欣喜地探索著這城，大家聊到不同的國家和文明，這時候阿果思考到：

要是有人問我，你喜歡做誰的子孫呢，阿力山大大帝、彼得大帝、凱撒還是李察獅王，我當然做黃帝的子孫。問的人就說了，在這裡，做皇帝的子孫有什麼好處，你會沒有護照的呀。我沒有護照。他們說，如果這裏的人要到別的地方去旅行，沒有護照是麻煩透頂的事。在這個城市裏的人，沒有護照而想到別的地方去旅行，要有身分證明書。證明書是用來證明你是這個城市的人，證明書證明你在這個城市裏的城籍。

——你的國籍呢

有人就問了，因為他們覺得很奇怪。¹⁰³

小說裡阿果他們在文化上依然認同自己是作為一個民族和文化體系的中華民族的後裔，但儘管這樣，仍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與現在的中國人是不同的存在。西西創造了一個合理的歸屬——「城籍」：

你於是說，啊，啊，這個，這個，國籍嗎。你把身份證明書看了又看，你原來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¹⁰⁴

「城籍」為身處殖民地不被宗主國所承認又不屬中國的香港人提供了重新探索確認身份的可能。王德威將香港視為「以一個城市的立場，與鄉土/國家（country/country）的論述展開了近半個世紀的拉鋸」¹⁰⁵，而香港人是與中國的中國人區別開來的某個新的人類集團。¹⁰⁶ 阿果醒覺自己熱愛這城，不知不覺中已與此城結下了不解之緣。

¹⁰² 同前註，頁 178。

¹⁰³ 西西，《我城》，頁 144。

¹⁰⁴ 同前註。

¹⁰⁵ 王德威，〈香港——一個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300。

¹⁰⁶ 金惠俊，〈西西《我城》中以空間為中心的香港想象與方式〉，頁 118。

其次，阿果、阿髮他們安居此地，單純盡責地守護家園，但並不迴避這城及這城所在的地球的危機：環境污染、人口激增、能源缺乏以及人類的貪婪等，於是渴想建造一個美麗的新世界，「美麗新世界」的願景成了「我」內心的內在空間他者，時時提醒著我反思我與此地的關係，「我」是自我為中心地佔據此地，只顧自己「上岸」¹⁰⁷，不管其他；還是願意保持敞開之心胸，從我做起，讓此地變得更好？「此地」與他者「美麗新世界」之間有無限的距離，「此地」有一天或許也會成為流離之地。這個時候，「我城」就不僅僅再以居住的方式、場所或空間被看待，而是以隱喻的方式賦予一種責任意識。本文認為「我城」意識不單單是對一座城的認同，更是作為靈根自植的安居者萌生的責任意識。西西在〈害怕與恐懼：尋找卓古拉〉一文提及，「我們被拋到這個世界來，是的，但虛無是起點，而不是終點。我們不必問存在『是』什麼，而要尋求『如何』存在」¹⁰⁸。不僅「居」於此處，也很自然地會思考：我在這裡，我該做什麼？並且不只是此處——我城，更是思考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地球，人類所安居之處。如巴修拉（Bachelard）描述樹「扎根」的意象與土地的聯繫時所描述的：

在樹根這邊，人們立即夢想到整個土地，仿佛地球大地是眾多樹根的一個結，仿佛只有樹根能夠保證地球大地的綜合。接著應該出現的是：所有生命與所有意志都首先曾經是一棵樹。¹⁰⁹

每個人首先扎根於一方水土，並且連於彼此，連於地球。「我城、地球興亡，人人有責」這樣的責任意識在《我城》中非常明顯。小說中五次提及「美麗新世界」的願景，而這個詞的前面都有一個動詞「創造」或「建立」。阿果的妹妹阿髮有兩個願望，「一，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¹⁰⁷ 粵語網路用語中「上岸」的意思是一個人離開了某種較為艱難的處境，達到了想要的目標。「岸」是指一種穩定的、可靠的狀態。

¹⁰⁸ 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頁55。

¹⁰⁹ Bachelard, Gaston. *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u repos*. Paris: José Corti, 1948, p. 311.

二、將來長大了要創造美麗新世界」¹¹⁰。阿髮當然不是說說而已，她和阿果犧牲休息時間，幫助鄰居們清掃天臺垃圾，寫信倡導環保意識，呼籲大家愛護家園，從我做起。西西和何福仁的對談中，也談到這樣的態度：

那時每天都發生不少事情，水災、難民……許多都不是我們能夠把握，能夠改變的。我的確只能用這麼一種比較樂觀的態度去看，去想；年青人大概只能這樣，先做好本份，一切從自己開始。然後，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否則，沒有希望的話，人怎麼活下去呢？¹¹¹

然而，西西恐怕明白「希望」終究也是虛妄的，小說結尾四處架電話線的阿果，終於接通了電話：

——在南端的冰山之中，有一座新的山將從地殼中升起，海面會有一個島，這即是我們另外一個地球。

電話聽筒那邊的聲音說。——在這新的星球上，地下埋藏的礦產，比原來的還要豐富。海洋裡的水，都是未經化學品染汙過的。我們會坐船，到這新的行星上去，我們的船是第二艘挪亞方舟。舊的地球將逐漸萎縮，像蛇蛻落蛇衣，由火山把它焚化，一點也不剩。人類將透過他們過往沉痛的經驗，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麗的新世界。¹¹²

這裡引用《聖經》的典故，乘坐第二艘挪亞方舟，重新開始。然而應許之地也並非不勞而獲，以色列人進迦南美地也需要勇敢爭戰、用智慧建造。人類也一樣，即便有一個新的星球，也需要用心「建立」美麗的新世界。西西的「我城」意識是一種先知性的警告或宣講，因為當我們回溯人類第一艘挪亞方舟便能明白西西隱藏的憂患意識。《舊約·創世紀》第六章第五至八節記載：

¹¹⁰ 西西，《我城》，頁48。

¹¹¹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3）〉，《素葉文學》第19期（1983.8），頁25。

¹¹² 西西，《我城》，頁217-18。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¹¹³

因為人類的惡貫滿盈，上帝降罰於人類。上帝揀選了挪亞一家建造了方舟，在大洪水淹沒大地時，方舟保存了挪亞一家人和各種成雙成對生物的性命。洪水過後，人和動物以及大地重新繁衍，上帝以彩虹與所有生物立約，應許不再有洪水毀滅大地。那麼，《我城》「第二艘挪亞方舟」的出現是否也隱喻著現實世界的墮落和沉淪？美麗新世界更映襯出萎縮的、被污染的、能源消耗殆盡的此地，也向我們發出詰問：你要如何行？行動以先必有省思。阿髮創造美麗新世界的渴望並非空想，而是因為受了很好的班主任的影響，「阿髮的班主任是一位得到全班同學敬仰尊重的女班主任。她教書很細心，做事有條有理有計劃，人不兇，從來不見她打罵學生，但大家聽她的話，上課又靜又留心，沒有一個同學不喜歡她。除了教書盡心外，這班主任又很關心學生，時常勸大家不要懶惰，又告訴各人做事要有毅力，有恆心」¹¹⁴。阿髮的班主任醒覺到自己這代人的懶惰、能力有限，進而鼓勵、影響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踏實做事、做人：

班主任說，目前的世界不好。我們讓你們到世界上來，沒有為你們好好建造起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實在很慚愧。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們懶惰，除了抱歉，沒有辦法。我們很慚愧，但你們不必灰心難過；你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你們年輕，你們可以依你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的新世界。¹¹⁵

¹¹³ 《中文聖經啟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5），頁44。

¹¹⁴ 西西，《我城》，頁48。

¹¹⁵ 同前註。

所以，西西的「我城」意識是安居此地的「我」醒覺並且回應土地的呼喚，萌生對此地、對他人的責任意識。這種醒覺是意識到自身與環境的困限以及責任之艱鉅。所謂理想的安頓之處——一個烏托邦式的美麗新世界究竟是否存在？原典《美麗新世界》恰恰是反烏托邦代表作，表明了對科技與機器文明的徹底絕望。¹¹⁶西西特意用典達五次之多，表明安居者對處境之艱難有著清醒的認識，但仍能根植於足下踏踏實實的努力。勞思光先生藉瓶花來書寫一種理想的安頓：「莫嘆寄根無淨土，解施人力便回天。」¹¹⁷理想的安頓之處不一定是故國或此地，也不一定是彼岸的美麗新世界，而是你的心是否安頓，你的力願否竭誠為此地。

四、攝影式觀看與自省式觀看

上文論述一群安居者，安居此地意味著對此地的責任意識，以下將進一步闡述「安居者」在「此地」發現自我的方式——「觀看」，這群人不僅是安居者，還是觀看者。約翰·伯格（John Berger）指出，「觀看先於言語。孩童先學會觀看和辨識，接著才會說話」¹¹⁸。人透過「觀看」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人如何觀看也影響人如何建構身份，前文提及一些學者認為香港的「本土」及「身份」具流動性或虛幻性，本文嘗試從小說人物觀看方式的角度提供詮釋的另一可能。之前的研究對於《我城》人物的觀看有所探討，例如何福仁認為阿果、阿髮、麥快樂等用孩子的眼睛觀看世界，天真稚趣，與人為善¹¹⁹，謝曉虹認為阿果及悠悠是城市冷靜的觀看者，尋找介入城市的可能性¹²⁰，除此以外，小說中

¹¹⁶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5).

¹¹⁷ 勞思光，〈偶聞有人言以麻油注瓶花〉，《思光詩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55。

¹¹⁸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頁1。

¹¹⁹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頁47。

¹²⁰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讀西西《我城》〉，

是否有其他的觀看方式？阿傻是一個通常被忽視的小說人物，他獨特的觀看方式或許能讓我們看見《我城》的更多面向。再者，小說創作者西西的觀看方式也值得我們留意，西西的觀看方式與小說人物有什麼不一樣？不同的「觀看」方式又是如何影響「我城」意識建構的呢？

小說第十三章第一次出現「我城」一詞，阿果郊遊回家，母親問他看見了什麼，阿果他們看見一座廟，阿傻說不如去求一支籤吧。

——你求了些甚麼呀

大家問。

——天佑我城

他說。¹²¹

西西藉阿傻發出「天佑我城」這溫暖厚重的祈願，純屬偶然，還是必然，值得一探究竟。阿傻是小說第十二章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麥快樂的朋友，阿傻和阿果、悠悠等一樣是城市的漫遊者，不過阿傻手中多了一部相機，阿傻喜歡遠足，喜歡到處走走看看，喜歡拍照。謝曉虹藉19世紀初法國漫遊者形象來探討20世紀70年代的阿果、悠悠等¹²²，忽視了當時的法國漫遊者尚無照相機這一事實。一個手拿相機的漫遊者和沒拿相機的漫遊者觀看到的世界可能是不一樣的。照相機的發明為人類帶來了全然不同的觀看方式，至今仍影響著人類。小說中這樣記述：

阿傻喜歡遠足，每次一定帶著他的照相機，照相機裏裝上可以拍攝七十二幅照片的膠卷，對於無論甚麼景物，只要他高興，就嚓的一聲攝下來。他從來不理角度距離，有時甚至連光線也不很尊敬，因此，他拍的照片，都是非常即興的。¹²³

照相機自1839年發明以來，一直和城市的發展扣上緊密的關係。早在1845年，香港島就出現了商業照相館，1845年3月6日《德臣西報》（*The*

頁 100。

¹²¹ 西西，《我城》，頁 160。

¹²²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讀西西《我城》〉，頁 87-92。

¹²³ 西西，《我城》，頁 132。

China Mail) 刊登廣告稱在中環卑利街近皇后大馬路處開設了一家經營達蓋爾攝影法的人像照相館，起初給香港的外籍人士拍人像，最早可以確定年月的香港最早的景物照片是1858至1859年之間拍攝的。¹²⁴ 至20世紀70年代，照相機已經進入香港尋常百姓家。「攝影與一種最典型的現代活動——旅遊——並肩發展」¹²⁵，拍照滿足了大都市人抓拍各種風景照的需要。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的《論攝影》一書探討了攝影與文化、社會幾乎所有相關話題，被視為「攝影聖經」，她論述了過去一百多年來，攝影如何深刻地改變了我們觀看世界和自身的方式。

《我城》意識到這種現代影像藝術對觀看帶來的影響，小說中提及照相的場景，不少與阿傻有關。阿果在郊遊時認識阿傻，當時阿傻「正在手拿一個照相機，這裏攝攝，那裏拍拍」¹²⁶。小說其他人物的命名大多可以聯想到他們代表的角色，但為什麼給阿傻起名「傻」卻不明確，文本也看不出阿傻是不是麥快樂的公園同事花王傻，可能阿傻總是拿著相機這裡拍拍，那裡攝攝，在當時看來傻乎乎的。有趣的是，今天人人都拿著智能手機四處拍攝，豈不都是阿傻，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阿傻的觀看方式與「我城」意識有什麼關聯，與眼前的這城又有什麼聯繫。

阿傻熱衷於照相，攝影是阿傻眼睛的延伸，阿傻透過相機觀看著這城。在這些閒逛者 (Flâneur) 的眼中世界是「如畫」的¹²⁷。攝影式觀看首先意味著深諳觀看之樂，傾向於發現美，尤其在因太普通而為大家視而不見的事物中發現美。¹²⁸ 假期來了，人們彼此說，「到巴黎去吧，到羅馬去吧」¹²⁹，對於這個城市，「不屑一顧」¹³⁰。「當別的人說『到

¹²⁴ 黎健強，〈後公共影像時代的香港靜物攝影〉，香港文化博物館，https://www.heritagemuseum.gov.hk/archive/chinese/PDF/City_Flaneur-Edwin_Lai.pdf

¹²⁵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臺北：麥田出版社，2022），頁35。

¹²⁶ 西西，《我城》，頁134。

¹²⁷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頁97。

¹²⁸ 同前註，頁145。

¹²⁹ 西西，《我城》，頁133。

¹³⁰ 同前註。

處去走走』，說的人指的可能是荷蘭，要看的是荷蘭的風車；或者，指的是西班牙，要看的是西班牙的鬥牛」¹³¹。阿傻和麥快樂等卻喜歡在足下這個小城到處走走看看，「這個島城有許多離島」¹³²，「在這個小小的城市裏，其實有許多地方可以去走走。（……）來看看這裏的漁船、來看看海港、來看看炎夏白日下的沙灘，以及夜晚滿城燦爛的燈色」¹³³。

「沒人透過照片發現醜。但很多人透過照片發現美。除了相機被用於記錄，或用來紀念社會儀式的情況外，觸動人們去拍照的，是尋找美。」¹³⁴ 阿傻喜歡去郊外遠足，每次一定帶上他的相機，即便那個地方他「來過許多次」¹³⁵，熟悉到像一個嚮導一樣，帶領大家去找菠蘿，小說十七章，住在大廈頂樓上的人看見字紙裡面有一些人，其中有「一個知道甚麼地方有菠蘿的阿傻」¹³⁶。閒逛者的樂趣也在於抱持開放的心態，總能在即便熟悉的空間中不期而遇地看見美麗的、獨特的風景。阿傻很喜歡觀看，小說好幾處描寫阿傻在「看」，比如「阿傻把一隻海膽看了半天」¹³⁷，阿傻看見鄉間一間漂亮的屋子，「他看見木柵裏面長著花朵，即跑過去看了」¹³⁸。阿傻看到什麼景物，只要高興了，就拍下來。一行人到達涌鎮，看古城上的幾門大炮，「阿傻忙著替大炮拍照」¹³⁹。阿傻在這個城市的郊外閒逛，享受著觀察的樂趣，創造了「影像化」的這城，影像裡的這城與現實的這城有什麼不一樣？美化是照相機的經典功能。阿傻個人的觀看也隨著攝影式觀看而發生改變，這城或許在阿傻眼中更為「好看」，更美。

¹³¹ 同前註。

¹³² 同前註，頁 132。

¹³³ 同前註，頁 133。

¹³⁴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頁 139。

¹³⁵ 西西，《我城》，頁 147。

¹³⁶ 同前註，頁 206。

¹³⁷ 同前註，頁 137。

¹³⁸ 同前註，頁 138。

¹³⁹ 同前註，頁 153。

其次，攝影式觀看是某種片面的觀看的行為，也是一種主觀的習慣。阿傻拍照非常「即興」，他不理角度、距離、光線，非常率性，這也反映了拍照對阿傻來說不僅是一種觀看的新方式，也是一種表演的新活動，這種新活動允許人展示某種獨特、熱忱的感受力。70年代香港的攝影技術已經相當普及，例如小說中提到另一個一起去郊外的年輕人表演拍電影的節目，「他借了阿傻的照相機，把自己的球鞋脫下來放在草地上，仔細地拍攝起來。他一會兒跳起來，一會兒奔跑，一會兒躺在草地上，一面拍一面解釋這是凝鏡，淡入淡出，什麼什麼」¹⁴⁰，顯然，當時的人們不缺乏攝影技術的概念。不過阿傻拍照刻意不用技術是他個人主觀的觀看的習慣，這種「即興」、隨意和誤打誤撞地拍照方式正反應了攝影本身自帶的超現實的氣質（*natively surreal*）。超現實主義常常追求偶然，歡迎不請自來、令人欣悅的無序。有什麼比實際上是自我生產，而且是不費吹灰之力的自我生產的客體，更加超現實？¹⁴¹ 小說中記述了一幅阿傻拍攝的頗為超現實的照片：

拍的是美麗澳。照片裏的麥快樂正和一群人一起提著鐵鏟掘山泥。我們幫助度假營開山，麥快樂說。麥快樂和阿傻一起參加過冬令營，所有的人七點鐘就起來做早操。那時候是冬天，是嘴巴呼出白霧氣來的十二月。冬令營的棉被比羊還可愛。因為這是一張很即興的照片，所以，很是可惜，照片裏的人都不見了頭。¹⁴²

「不見了頭」的照片隱喻了照片的碎片性，照片是一片薄薄的空間和時間，鏡頭下的影像既熟悉，又陌生。拍攝的是一群相熟的度假的朋友，但白氣繚繞，照片裏的人都不見了頭，不真實的超現實感油然而生。照片如此，透過照片觀看的世界也是如此。阿傻以一系列隨意的、碎片化的照片來記錄或者美化眼前的風景，這是一種簡化又充滿熱忱地觀看，阿傻熱切地表達著複製這個世界的嚮往。攝影式觀看到的世界還是

¹⁴⁰ 同前註，頁 145。

¹⁴¹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頁 93。

¹⁴² 西西，《我城》，頁 132。

這世界嗎？矛盾的是，「相機開始複製世界的時候，也正是人類的風景開始以令人眩暈的速度發生變化之際：當無數的生物生活形式和社會生活形式在極短的時間內逐漸被摧毀的時候，一種裝置（照相機）應運而生」¹⁴³。香港是一座超現實城市，昨日的海岸線，今日已變成車水馬龍的馬路，今天華麗的大廈剛建成，明天那邊的舊樓被夷平了，超現實摩天大樓如同擎天柱般多變、奇異。

身在70年代香港的人，大概對這種急劇變化並不陌生，自1971年港督麥理浩上任以來，香港城市建設快速發展，《我城》也記述了這種變化感。閒逛者對於變化大概是最敏感的，城市的各個角落都在他們漫遊的腳蹤裡，《我城》中另一位喜歡散步、閒逛的悠悠顯然感知到了這城的變化，「她總是看，又總是看見，這個地方又改變了很多」¹⁴⁴。離家的遊子也格外敏銳於城市的變化。船上的船員問阿游，「我們的城，是不是多了許多的樓房，是不是人又比以前多了。發問的人，離開城已經兩年了。兩年會使一個城改變許多」¹⁴⁵。當城市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曾經拍攝的城還是這城嗎？攝影式觀看的動機究竟是什麼？

阿傻為什麼喜歡拍照？小說本身沒有解釋。蘇珊·桑塔格提到拍照可以給迷失的人帶來安慰，尤其是飽受無情職業道德摧殘的人，如德國人、日本人，這些地區的人工作壓力極大，拍照可以平息在假日時不工作的焦慮，他們可以拍照；另外，被剝奪了過去的人，似乎是最熱情的拍照者，尤其與過去的割裂所帶來的創傷特別尖銳的國家或地區，甚至生活在工業會社會裡的每一個人。¹⁴⁶ 這兩點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阿傻愛拍照的動機，阿傻大概也是一個生在70年代的香港打工仔，從《我城》對阿果、麥快樂、阿游的工作描述也不難看出他們工作的艱辛，正如創作於70年代的粵語歌《半斤八兩》所唱的，「我哋呢班打工仔，通

¹⁴³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頁44。

¹⁴⁴ 西西，《我城》，頁109。

¹⁴⁵ 同前註，頁168。

¹⁴⁶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頁36。

街走糲直頭系壞腸胃，搵個些少到月底點夠駛（捋過鬼），確係認真濕滯」。另外，如香港的另一位作家小思在〈香港故事〉裡所寫的那樣，香港身世朦朧，香港人沒有歷史感，大概是出於迴避歷史的悲情。¹⁴⁷不僅如此，70年代香港正處於工商業急速發展的時期，日新月異中人更容易感受到與過去的割裂。如此，拍照可以緩解不安全感 and 焦慮感。延續至今，智能手機流行的當代，人人攝影，萬物皆可拍，明顯，攝影式觀看已經成為風靡全人類的觀看方式。收集世界的影像仿佛收集世界，人透過攝影來展現掌控感。

小說雖然沒有解釋阿傻為什麼喜歡拍照，但是卻解釋了阿傻為什麼喜歡遠足：

只要看見別人高興，阿傻就也高興了。這就是為什麼阿傻喜歡遠足的緣故。當你跑到離市中心老遠的地方，你總可以看見許多笑著的眼睛鼻子。大家的臉都紅紅的，衣服寬闊舒服，腳步輕鬆。在市中心，你看見的是甚麼樣的臉面呢。睡不醒的眼睛，自言自語的嘴巴，兩邊徘徊的耳朵，賽跑也似的腿，出冷汗的雙手，傷風鼻子、手肘、拳頭。¹⁴⁸

阿傻喜歡遠足，因為喜歡看見別人開心，這或許也是他喜歡拍照的一個原因吧，人們在拍照時一般都會表現得比較開心。阿傻不僅拍城市的景物，也拍朋友，「麥快樂的若干照片，就是阿傻拍的」¹⁴⁹，小說第六章整章講述了「一些給大家看看的相片」¹⁵⁰，這些照片中有四張是麥快樂的照片，很有可能就是阿傻拍的。攝影式觀看另一個值得留意之處如麥納·懷特主張的那樣，拍攝者透過相機來發現自己，繼而發現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與世界的關係，風景照片實際上是內心風景¹⁵¹。「我們

¹⁴⁷ 小思，〈香港故事〉，《中國語文傳意進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頁194。

¹⁴⁸ 西西，《我城》，頁138。

¹⁴⁹ 同前註，頁132。

¹⁵⁰ 同前註，頁55。

¹⁵¹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頁186。

只看見我們注視（觀看）的東西。注視是一種選擇行為。這行為將我們看到的事物帶到我們可及之處……我們注視的從來不只是事物本身；我們注視的永遠是事物與我們之間的關係」¹⁵²。阿傻在拍照中經驗與人的友情，也經驗自己與「此地」的情感聯結。愛在這城到處拍照的阿傻自然對這城「擁有」意識是最強的，「我們擁有一張照片便是擁有我們珍愛的人或物的替代物。這種擁有，是照片具有獨一無二的物件的某些特徵」。¹⁵³在攝影式觀看美化的影響之下，阿傻對這城也發生了移情，照片展現的我城的特徵——山山水水、街頭巷角都具有了別樣的美感和情懷。面對著快速變化的城市，割裂的歷史，一切都變得有些超現實、難以掌控，所能做的也只有留下當下這城的影像，以及發出「天佑我城」的祈願。

第十二、十三章是整本小說比較集中探索「我城」意識的章節，第十二章講述公眾假期時，阿果、麥快樂、阿傻、阿傻的朋友，以及阿傻的朋友的朋友一起去郊外遠足，他們一邊自由探索著這城，一邊漫談，不禁思考自己的存在，想出了「城籍」一詞。之後阿傻去廟裡求籤，祈禱「天佑我城」。美好的祈願和想象的實質是什麼？70年代的年輕人已經無可避免地受攝影式觀看的影響，人學會透過照片看自己、看世界，照片直接帶我們進入的，並非現實，而是影像。¹⁵⁴影像裡的世界與影像外的世界有何關聯？換言之，阿傻的「我城」與70年代的這城有什麼聯繫，與西西的「我城」又有什麼聯繫？這恐怕也是西西想去表達的。

西西《我城》的創作視野不是攝影式觀看，西西的觀看可以稱之為自省式觀看。攝影式觀看關注觀看影像裡的世界，側重表現；而自省式觀看關注影像外的世界，側重理解，邀請觀者（讀者）思考影像之外的現實世界、人生的真相或本質。攝影式觀看常為觀看對象「賦魅」，自省式觀看以攝影式觀看為他者，並不排拒攝影式觀看，以攝影式觀看或

¹⁵²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頁11。

¹⁵³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譯，《論攝影》，頁238。

¹⁵⁴ 同前註，頁240。

者其他觀看方式為思考的契機，同時保持自省，明白自己所見的有限，多一些反思和追問。即便是西西自己的文字世界，她都邀請讀者參與進她的創作過程，去思考《我城》如何被建構，如何理解這種建構。自省式觀看目的是反省，甚至是自我質疑、對話和醒覺。小說第十七章岔出主體敘述，以胡說的口吻講述創作動機、緣起，創作理念「都很好」，敘述方法移動式敘述等，西西也藉一堆尺七嘴八舌地來觀看小說、衡量小說：

一把彎彎曲曲的尺首先說，這堆字紙不知道在說些什麼，故事是沒有的、人物是散亂的、事件是不連貫的、結構是鬆散的，如此東一段西一段，好像一疊掛在豬肉攤上用來裹豬骨頭的舊報紙，說著，打了一個呵欠。一把非常直的尺把頭兩邊搖了三分鐘，不停地說：我很反感，這是我經驗以外的東西。有一把尺是三角形的，是一把作不規則形狀非等腰形的三角尺，它努力在字紙中間尋找各式各樣的形狀，結果找不到自己的三角原形，連圓形、長方形、六角形也沒有，就嘆了一口氣。¹⁵⁵

這樣的觀看好像是西西本人邀請讀者加入她的觀看。自省式觀看的人時常反思自己的所見，甚至站在被觀看者的角度反思所見是否真確，也邀請讀者一同加入對方的觀看。讀者讀到時隨即意識到自己與作者的存在，並開始反思自己的所見。小說中幾處看見這樣的自省式觀看，例如：

離島的輪渡經過無數小島，偶然，船經過一個孤島，輪渡上的搭客看見島的沙灘上有一个人躺著曬太陽，看見的人就說了：這樣的生活太舒服了。而躺著曬太陽的人則說：這就是當領袖的滋味麼。¹⁵⁶

一個人在孤島上參加青年領袖訓練計劃，不知情的觀看者以為自己看到了真相，但小說立即加進被觀看者本人的視角糾正觀看者的所見。西西明白所見的有限，總是隨時切換觀看視角，反思所見；而習慣攝影

¹⁵⁵ 西西，《我城》，頁 207。

¹⁵⁶ 同前註，頁 137。

式觀看的人通常相信自己的所見，時常會強化影像的世界即真實，並且自動為影像賦魅、美化。好像柏拉圖所描述洞穴裡的囚徒，生來只能看到洞壁上晃動的影像，以為是真實的，如果給一名囚犯鬆綁，讓他站起來，轉身向出口望去，看見這些以往所見的影子的原型，能否想象這時會發生什麼？他可能會認為所看到的東西都不是現實。阿傻喜歡拍照，「麥快樂會從口袋內掏出相片來給大家看，你們看，他說，上次，我們就是到這個地方去的，這個島叫大苔島」¹⁵⁷，小說裡的人物似乎習慣於從影像中了解這城的各個角落，在此城的影像世界中所見的是什麼？受此觀看方式影響建構的所謂「我城意識」呢？數年後當影像中的城市物是人非，「我城」還在嗎？

自省式觀看可能會從攝影式觀看方式中找到思考的契機，原來攝影式觀看到的城和人是這樣的，那我怎麼看呢？小說第六章西西邀請讀者看幾張照片，小說這樣的設計恰恰讓我們看到西西的觀看不停留在影像裡的人、世界，她看影像是一個想像的空間，思想的熱情和求知欲使得自省式觀看思考影像背後的故事是什麼？西西提出用「所知」的看「所見」的¹⁵⁸，由此，觀看者與觀看對象之間的對話便形成了。這幾張照片，其中有麥快樂的四張照片，一張麥快樂站在公園的木馬旁，一張坐在大球場的石級上，一張站在一座涼亭的背面，一張站在快樂王子公園門口的快樂王子銅像石座下。西西的觀看沒有停留在照片凝固了的片段的空間和時間中，而是一邊說明照片的場景、人物，一邊敘述照片裡流動的故事，藉著幾張二維的照片，講述了麥快樂這個人的為人、際遇、城市人情的冷暖等豐富立體的故事。譬如，麥快樂為人善良、熱心，「他要照顧公園，還要照顧公園裏面的小孩子，小孩子的祖母，祖母的女兒，女兒的嬰孩，等等」¹⁵⁹。麥快樂搭電梯時因為被人嫌棄、拒絕，而特別

¹⁵⁷ 同前註，頁 132。

¹⁵⁸ 艾曉明，〈看圖說話——西西創作中的圖文互涉探討〉，《西西研究資料（第 1 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 114。

¹⁵⁹ 西西，《我城》，頁 57。

不快樂。後來麥快樂因為犯了幾次過失，失業了。這座城呢？「在這個城內，可以讓牠們（燕子）棲息的簷樑越來越罕了。至於那些逗留在港口的野鴨，永遠不會飛到公園來。」¹⁶⁰ 自省式觀看不僅自己如此帶著誠實求知的心觀看思考，也邀請其他人如此觀看、思考——「沒有燕子的快樂王子，是否還叫快樂王子呢？」¹⁶¹ 容不下燕子的城市還有快樂嗎？這樣的城還是「我城」嗎？

西西敏銳地意識到影像化時代來臨時對人帶來的影響，攝影式觀看賦予被再現者獨特的魅力，她也以攝影式觀看為他者，反思自己的所見。《我城》除了阿傻可能受攝影式觀看方式的影響外，其他人的觀看方式仍有待一一釐清，每個個體的「我」都是一個獨立的觀看者。每個人的觀看方式可能不止一種，阿傻除了採取攝影式觀看，可能也有自省式觀看的時刻。觀看方式不同建構出的世界、自我身份意識也不同。阿傻的「我城」或許不等於西西的「我城」。小說裡的阿傻觀看到的和其他小說人物觀看到的「我城」恐怕也不盡相同，各自看到各自的「我城」。那麼，各自所見的片斷有何意義？這恰恰是他者理論所要強調的，觀看到的總會有所遺漏，攝影式觀看到的影像有所限制，自省式觀看也不是全知全覺，但當不同人觀看到的「我城」都呈現出來、交叉匯合的時候，觀看者會看見，原來他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對話、思考便由此發生，攝影式觀看也可能會轉化為自省式觀看，自省式觀看也會進一步加深對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我城」在不同人的觀看中被反復建構，流動的或是虛幻的，仍然有意義，在彼此的對話中更認識自己、認識這城。

¹⁶⁰ 同前註，頁 66。

¹⁶¹ 同前註，頁 66。

五、總結

學者們普遍認為西西的《我城》率先參與了香港意識的文學想象，為什麼是西西？西西1950年從上海遷徙到香港，她不屬於香港「南來作家」之列。五十年代初期，大批作家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力匡、徐速、燕歸來、李輝英、夏侯無忌等作者，他們被稱為「南來作家」，其作品題材不少與「懷鄉」有關，每每藉肯定過去來否定現在。¹⁶² 西西的寫作不是冷眼旁觀香港，而是投入此城，「我城」這個名字已經表明作家的選擇，王安憶稱西西為「香港的說夢人」，西西與香港的關係「是真實和夢境的關係，而文字將此夢境固定下來，使之免於消散和流逝」¹⁶³。《我城》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本土社會為創作藍本，以童話寫實的風格展現了中學畢業生阿果為代表的年輕人眼中香港這座城。移居香港的哲學家唐君毅先生1961年發表文章感歎離散背景下華人及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之後進一步為海外華人提供了第一個人生哲學構想——「靈根自植」¹⁶⁴。文學、哲學領域，對於飄散在國際大都會裡的華人，都不約而同地有了新的觀察、思考和構想。

值得注意的是，人飄散四方，接觸差異，唯有在與「他者」真誠相遇的過程中，才能通過省思生命意義返回本真自我，植下精神生命的根苗。¹⁶⁵ 近代哲學家笛卡爾（R.Descartes）提倡「我思故我在」，西西談《我城》時表示：

¹⁶² 陳智德，《解體我城 香港文學 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52。

¹⁶³ 林寶玲，〈西西，香港的說夢人——記香港作家西西榮獲世界華文文學獎〉，《明報月刊》第 481 期（1996.1），頁 145。

¹⁶⁴ 沈清松，〈五十年來中國哲學的花果飄零與海外華人的生命意義構想〉，頁 7-34。

¹⁶⁵ 同前註，頁 31。

《我城》不是要人感動的小說。——我一直不喜歡那些設計令讀者「感動」、「認同」的小說，而是希望引起思考。想想我們的環境，想想人與人的問題。¹⁶⁶

本文以《我城》為藍本窺探其內部隱含的身份意識問題，從中不難看出「我城」意識建構所涉及的「他者」參照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對象，「他者」的內涵也很豐富，前文所述的「飄零者」指向「我」已是此地的安居者，活在當下，迎納他人和未來，「飄零者」則對於流亡寄身之處充滿著疏離感，孤立、自我封閉，被困在背井離鄉的記憶中，緬懷著回不去的故土。「理想的安頓之處」扣問安居者們，「我」在此地／這城的責任意識，「責任就是自己應該奉獻出力量的事」¹⁶⁷，我該為此地做什麼。此外，人的「觀看」方式影響對自我、世界的建構。「攝影式觀看」提醒「我」所見的是暫時的、有限的，時移境遷，攝影式觀看如今已經成為社會主流的觀看方式，「我」是否能夠自省自覺，思考如何面對這個無常的人生和變幻莫測的世界。

前文論述中也強調了「他者」與「自我」並不是截然二分的，有的時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依存關係¹⁶⁸，「他者」與「自我」之間有時也是互相流動、彼此啟發的。例如第一組參照對象中的飄零者「荷花們」與安居者「阿果」等，他們之間固然有差異，很多時候也能有效溝通彼此理解和尊重。飄零者與安居者在此城交匯相遇，若是飄零者可以在流離失所的經驗中被治癒，投靠、棲留此處，接受此地的迎納，紮根此地，或許飄零者也能成為安居者。反之，如果安居者未能保持迎納他人之心，心高氣傲、自我封閉起來，待遭逢風雨之時，是否仍能安然自若？再者，「我城」一方面區別於飄零者理想的安頓之處——「現

¹⁶⁶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3）〉，頁 25。

¹⁶⁷ 勞思光，〈自由與責任〉，收入《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179。

¹⁶⁸ H. Christoph Steinhardt, Linda Chelan Li & Yihong Jiang, 'The Identity Shift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8.1389030>.

代民族國家」，但仍需運用「國家」的構造方式來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¹⁶⁹；另一方面安居者理想的安頓之處——美麗新世界看上去如同鏡花水月，但何嘗不是一種警策，此地為什麼不能成為美麗新世界？若是不警醒，此城甚至整個地球有一天也有可能成為荒涼的廢墟，而「我」又將去往何方。同時，人的觀看方式會影響主體意識的構建。攝影式觀看那種超現實、美化的影像可以觸動人去反思影像裡的世界與此地、與「我」到底有何關聯，或許攝影式觀看可以轉化為自省式觀看，「我在這裡」，我看見什麼，我如何行動。這些多元他者之間的相遇互動都引向我作為安居者的回應與責任，任重而道遠。

此外，這三個多元他者之間也是密不可分的，分別對應「人」、「地」、「觀看」，「他人」、「他地」、「他看」三位一體幫助構建了「我」、「此地」、「我看」的主體意識。瓦爾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土地》一書中提出「無地容身」（Rootlessness）是人生「無意義」（Meaningless）的原因。人觀看、尋找「地方」（place），在當中活出「自由」。「地方」是一處「空間」，讓人確立「身份」，尋找召命。¹⁷⁰一個「空間」如何成為一個「地方」，最後成為一個「家園」，需要人自省自覺，與多元他者相遇、走向他者，與此地休戚與共，共同建造，在此地的土壤中一同讓文化被孕育出來，茁壯成長。西西「我城」意識的重點或許不是「我」是誰，也不是「我」多麼熱衷於這個本土香港的獨一存在，更不是「美麗新世界」在哪裡或者到底存不存在，「我城」意識發端於此地，又當不囿於「場所」，而是以轉喻的方式賦予一種人之為人在此地踏實奉獻自己力量的責任意識。何福仁也認為西西《我城》的「我」必須察覺生存情境的瞬息變動，承擔此地的前程命運：

這個我，置身在各樣的人際關係中、城裡城外各種環境裡，不過是群體裡的一號，沒有什麼了不起。必須謙虛的學習，要改善環

¹⁶⁹ 羅崗，〈想象香港的一種方式〉，頁 64。

¹⁷⁰ Walter Brueggemann, *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 (Second Edition)*, Fortress Press, 2003.

境，就得從改進自我出發，踏實虔誠，彼此協心，才能眾志成城。¹⁷¹

「我城」中的「我」投入於此城的生活，勤於自省，「看」自己、「看」他人、「看」世界合乎中道，在「此地」從日常小事做起愛護珍惜此地，學習接受他人的善意，也迎納鄰舍、他人。如是，恐怕哪裡都可成為「我城」，自植靈根，吾心安處是吾鄉；否則，恐怕「我城」真是虛幻的影像，人在此城，心在飄零。

近年來學界密切關注香港地區的身份危機事件，距離西西的《我城》出版四十年後，「我城」二字已成為香港社運的口號，與「香港人」身份認同劃上等號。正如詩人廖偉棠所講：「現在，我城早已不止是一本小說的名字，而是一種信念。」¹⁷² 西西一直關注著香港人身份意識的掙扎，不過本文認為建構香港的本土集體認同恐怕未必是西西《我城》的關懷。2019年「反送中運動」¹⁷³之後，西西在接受報刊媒體訪問時，對香港發生的事感到很痛心，以「危城」來形容香港的境況。對於年輕人，她感到虧欠：「年輕人並不欠我們什麼，相反，是我們欠他們，欠他們一個理想的社會。」¹⁷⁴ 與前文所述《我城》中班主任對學生們表達的愧疚如出一轍，四十多年過去了，西西的「我城」意識一直是一種自省自覺的責任意識，期望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自尊自重、自樹自立，與他者相遇，回應他者，關懷他者，即使於飄零之處也能自植靈根。

「香港人」這個身份於每個時空有不同的多元「他者」，「他者」的內涵也很豐富。「身份」因循著不同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要求，處於一個變更的「流動」狀態，各個不同的「我」攜帶者自己

¹⁷¹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收入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1989），頁228。

¹⁷² 黃愛琴，〈西西：我們欠年輕人一個理想社會〉，《信報月刊》第514期（2020.01），頁64-68。

¹⁷³ 反送中運動：2019年春夏之交，香港政府努力推動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在香港社會引發了大規模的民間抗議浪潮。自2019年6月初起，各種形式、規模不等的抗議活動持續不斷，「遍地開花」。

¹⁷⁴ 黃愛琴，〈西西：我們欠年輕人一個理想社會〉。

的歷史進到城中，某日也可能攜帶著此城的故事離開。如何深入地展示每個時空中香港身份「自我」與「他者」的全貌，仍然需要存嚴謹謙卑的態度對事情的複雜性有充分的評估。身份建構乃至重構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香港人是否可以在與多元他者互動中求得思想的進展，有待當前與未來的人們在理論上與實踐上的共同努力，以及不懈地批判性省思和觀察。這正是西西小說的魅力，也是研究西西小說的意義所在。

主要徵引書目

一、近人專書

- 王家琪等編，《西西研究資料》（全四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 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
- 西西，《我城》。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
- 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
- 呂大樂，《唔該，埋單》。香港，閒人行，1997。
-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陳智德，《解體我城 香港文學 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
-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 黎活仁等主編，《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
- 賴俊雄，《他者哲學：回歸列維納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
- 〔美〕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
-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黃燦然譯，《論攝影》。臺北：麥田出版社，2022。
-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e la volonté*. Paris: José Corti, 1947.
-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u repos*. Paris: José Corti, 1948.

- [法] 伊曼紐爾·列維納斯 (Emmanuel Lévinas) . *Totalité et infini*.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1980.
- [法] 伊曼紐爾·列維納斯 (Emmanuel Lévinas) .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aris: Vrin, 1993.
- [美] Peter Staffon & [英] Nicky Hay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Edward Arnold, 1998.
- [英]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 223-225.
- [美] Walter Brueggemann. *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 (Second Edition)*, Fortress Press, 2003.

二、期刊論文

- 沈清松，〈五十年來中國哲學的花果飄零與海外華人生命意義構想〉，
《漢學研究》第三十一卷第2期（2013.6），頁7-34。
-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3）〉，《素葉文學》第19期（1983.8），頁25-28。
- 金惠俊，〈西西《我城》中以空間為中心的香港想象與方式〉，《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十二卷第2期（2015），頁104-124。
- 陳潔儀，〈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東華漢學》第8期（2008），頁231-253。
- 黃冠閔，〈飄零乎？安居乎？——土地意象與責任意識〉，《中國文哲研究論壇》第十八卷第2期（2008），頁193-220。
- 張劍，〈他者〉，《外國文學》第1期（2011），頁 118-127。
- 張玲鈺、葉浩威、安寧，〈文學地理學視野下香港文化認同〉，《熱帶地理》第6期（2019.11），頁880-888。
- 範可，〈信任、認同與「他者」：族群和民族省思〉，《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十五卷第6期（2013.11），頁44-52。

-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讀西西《我城》〉，
《思與言》第五十六卷第2期（2018），頁73-113。
- 錢超英，〈自我、他者與身份焦慮——論澳大利亞新華人文學及其文化
意義〉，《暨南學報》第二十二卷第4期（2000.7），頁4-12。
- 羅崗，〈想象香港的一種方式〉，《二十一世紀》第6期（2001），頁
64-73。
- 黃愛琴，〈西西：我們欠年輕人一個理想社會〉，《信報月刊》第514期
（2020.01）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 Kit-Yee. 2008. "An Analysis of the Scientific Elements and the Modernity of Xixi's *My City*",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8, pp. 231-253.
- Kim Hye Joon. 2015. "Centered imagination of Hong Kong and the methods of imagination in Xi Xi's *My Cit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Vol.12.2, pp 106-124.
- Qian Chaoying. 2000. "Self, the others and Extremely Anxious of Body Identity—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Australia and its cultural meaning",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Vol 22.4, pp 4-12.
- Tang Junyi. 1975. *Chinese Humanities and Today's World*.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store.
- Tse Hiu-Hung. 2018. The Flaneur/Flaneuse and the Multiple "I"s of the "local" in Xi Xi's *I City*. *Thought and Words*, Vol 56.2, pp 73-113.
- Vincent Shen. 2013. "Chinese Philosophy in Diaspora and the Meaningfulness of Life for Chinese Overseas", *Sinology Studies*, Vol 31.2, pp 7-34.
- Xi Xi & He, Fu-ren. 1995. *About Time: Dialogues with Xi Xi*. Hong Kong: Su Ye Publishing Co. Ltd.
- Xi Xi. 1996. *My City*. Hong Kong: Su Ye Publishing Co. Ltd.
- Zhang Lingyu, Ye Haowei & An Ning. 2019. "Hong Kong's Cultural Identity from a Literary Geography Perspective", *Tropical Geography*, Vol 39.6, pp 880-888.
- Zhang Jian. 2011. "The other", *Foreign Literature*, Vol 1, pp. 118-127.

On “Many Other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City” in Xixi’s *My City*

Li-Li, Tang*

Abstract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vides important cl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Hong Kong identity. *My city* is a watershed in Xi Xi’s writings. Xi Xi wants to write about the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in the 1970s, their life and their city. *My city*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nge of Hong Kong’s soci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is often inseparable from ‘the other’, which is essential for the defini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elf-identity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hidden issue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identity consciousness within *My city*, and sort out the context of the emergence of loc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the other”. “The other” in *My city* is not a single one, but multiple. “I” and many others are not in a confrontational and dichotomous relationship. Sometimes there is a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ther and me, how to face the oth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attitude to establish one’s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society. I will argu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ree others in *My city*, namely: “Wanderer”, “Ideal Place to Settle” and “Photographic seeing”. The “wandering person” is full of alienation, isolation and self-enclosure for the place where he lives. “Wanderer” points to “I” who is already a resident of this place, generous and accepting of others; “ideal place to settle down” asks the resident about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I” in this place/city; the way people “see”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ciousness. “Photographic

* Lecture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Centre, Lingnan University

seeing” reminds “I” what I see is temporary and limited, whether “I” can reflect on myself and think about how to face this impermanent life and “this city” where I live.

Keywords: Xi Xi; *My City*; the other; identity; Hong Kong